

张晓山等●著

联结农户与市场

中国农民

中介组织探究

联结农户与市场

中国农民

中介组织探究

张晓山等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张晓山等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004-3311-5

I . 联… II . 张… III . 农产品 - 商品流通渠道 - 中介组织 - 研究 - 中国 IV . F3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4935 号

责任编辑 韩育良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字 印 数 3 000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作者名单

前言 张晓山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张晓山

第二章 张晓山

第三章 苑 鹏

第四章 马忠富

第五章 国鲁来

第六章 杜吟棠

第七章 潘 劲

第二部分

第一章 苑 鹏

第二章 刘惠 熊 进

第三章 国鲁来

第四章 潘 劲

第五章 杜吟棠

第三部分

第一章 潘 劲 苑 鹏

第二章 国鲁来

第三章 国鲁来 张晓山

第四章 罗远信

第四章 成建三 杜吟棠

第五章 崔红志

附录

一 国鲁来 罗远信

二 张晓山

二 杜吟棠 张晓山

二 国鲁来

全书由张晓山总纂及整编修订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本书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农民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完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对于提高我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从制度建设上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作用。

本成果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促进新、旧两种组织资源对接的新观点，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合作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发展和完善我国农民中介组织的新思路，其理论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居于先进地位。对政策决策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书成果的著作权不存在争议。

学术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签字：李周

2001年11月21日

专家评审意见之一

本书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农村率先改革，其经济体制已发生深刻变化，但农民中介组织的发育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此研究成果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是：1. 对农民中介组织发育和完善的理论研究从宏观和微观、新体制和旧体制等多层面进行，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为一般研究所不具备；2. 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促进传统的和新发育的两类组织资源的对接”的新观点；3. 在总结国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传统的和现代的合作经济的理论原则，提出了一套发育和完善我国农民中介组织的新思路。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今后我国农民中介组织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书研究方法科学，其成果论据可靠，事实清楚，文字表述准确，居国内领先水平，属优秀作品。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桂从明

专家评审意见之二

此成果，对于提高我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都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这是迄今为止，本人所看到的较为完整、系统地研究我国农民中介组织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论据或事实基本无误，文字表达清楚。

本书在下列方面有新的见解：提出了农业发展新阶段我国农民中介组织发育与完善的思路；提出了“两种组织资源有效对接的关键是理顺双方的产权关系；采取各种形式，解决各类新兴的农民中介组织的资金疏通问题”等等。这些论点很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管理总站研究员：李惠安

前　　言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但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所谓“三农”问题却日渐凸现。“三农”问题之所以凸现，用规范的话语讲，是因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生产已由资源约束转为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因此要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用以农业为主的那部分农民的话讲，这地是越来越难种了，种什么，什么多；调结构的结果是“你也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农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谁能告诉我，到底该种什么，种多少，种的东西能否卖得出去，能否卖个好价钱？

农民正在困惑时，又来了一堆新名词，什么“经济全球化”啦，WTO啦，转眼间，这些新东西又和农民的生产和收入搭上关系了。前一段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什么“新东北现象”啦，转基因大豆啦，眼瞅着玉米的价格下跌，订单减少，玉米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贸易格局基本已成定局，国外的转基因大豆也长驱直入地进入了中国，生产大宗农产品的农民日子越来越难过。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日子该好过了吧？难说。从2001年12月以来，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屡遭退运，主要集中在蔬菜、水果、中药材、天然蜂蜜等产品。山东是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大省，肉类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水产品出口占48%以上；蔬菜出口占

40%以上；青岛海关花生年出口占全国的70%—80%。可用山东同志自己的话说，2001年农产品出口，是一路红灯闪闪。2002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创汇比全国低6.7个百分点，问题主要是农产品出口受阻，人家用非关税壁垒来卡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该出的出不去，人家能进的都进来了。

严峻的形势下农业生产该怎么搞？农民的收入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日子怎么才能富裕？对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可谓是见仁见智，各有韬略。但有一点大家可以说是具有共识，那就是要发育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帮助农民进入市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什么是中介组织？农村的中介组织有哪些类型？它们目前的状况如何？它们在发育和发展中有哪些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对农民中介组织的界定

关于中介组织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一种理解是指规范、协调和管理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各种评估仲裁机构以及各种协会、商会、联合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另一种理解是指在生产和市场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各类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中提出：“发展联结农户和市场的中介组织，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纲要》所提及的中介组织与第二种理解和阐释相一致，也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本书中所说的农民中介组织是指在农民与市场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各类经济组织，并非特指仅由农民发起和组织的中介组织。它们的主要作用应是帮助农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方便快捷

地进入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民中介组织既包括农民的自助组织，也包括为农民服务的其他类型组织，主要类型有：1.农产品销售和农用生产资料购买组织（包括供销社、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民运销联合体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兴办的加工营销实体等各类经济组织）；2.为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包括农村信用社、清理整顿之前的合作基金会以及各种非正规的金融组织）；3.乡村社区组织。我们的研究重点一是改革前已有的传统的组织资源，如供销社、信用社和乡村社区组织；二是改革后新涌现的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以及公司加农户等组织形态。

二、农民中介组织创新的意义和作用——本书的理论框架

本书的理论框架是：在中国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根据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使生产要素自由进入要素市场，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说到底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从田头到餐桌，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包括营销）、信息等资源之间都要进行组合和配置，配置好了，经过流通环节处理的产品符合市场需求，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其价值，自然就有效益。资源之间的组合与配置，必然要通过制度变迁形成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通过组织创新使新的制度安排有相应的组织载体。在历史上，以家庭、厂商、行会、采邑、工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事例屡见不鲜（Douglass C. North, *Markets and Other Allocation Systems in History: The Challenge of Karl Polanyi*,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6, No. 3, Winter 1977），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D. 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文

版 1989 年, 第 3 页, 北京), 交易费用则是经济绩效的关键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1987)。制度和组织的创新要能减少交易费用, 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

制度和组织是什么关系? 笔者同意拉坦的界定, 即制度概念亦包括组织的含义。制度创新指: (1) 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变化; (2) 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3) 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 (V. W. 拉坦,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 第 329 页, 1991 年, 上海三联书店)。显然, 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密不可分, 在本项研究中所谈的组织创新, 必然也涉及到制度创新。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要有相应的组织创新为依托。

三、如何提高农民中介组织的效率

目前我国农村的中介组织的创新, 一方面是如何改造、利用农村现已存在的组织资源, 如乡镇政府、村社区组织、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乡镇的“七所八站”等组织形式; 另一方面是发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农村的新型经济组织, 如各地农村涌现的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以及其他类型的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本书对这两方面的创新都进行了研究, 并着重研究这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问题, 目的是探索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在发育新组织资源的同时,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造现有的组织资源, 形成农业科技能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产品能最终实现价值的网络体系, 使农民能节省交易费用, 能以较低成本、较快捷的方式整体进入市场。

在讨论中, 有些学者提出, 原有的组织资源与其说是遗产, 不如说是包袱, 改造传统的组织资源有无这个必要性? 它们又有什么优良资产可以利用?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

中，有无必要进行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传统的组织资源有无利用价值？我们的观点是，任何一种新发育的组织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它们必然要与外界环境发生种种关系，两种资源的对接，并不是出于理念上的选择，而是现实的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感到，除了合法性以外，农民自发形成的新型组织在资金金融通、资源禀赋上亦存在种种缺陷，如果能利用传统组织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本，组织网络，物质资产等），无疑会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快的发展。但利用的前提是改造，对于传统的组织资源来说，由于沉重的制度遗产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及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供销社、信用社这样的冠以“合作”名称的组织进行合作制导向的根本性改革所需成本太高，效果未必好，但进行彻底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它们的惟一出路。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必须让它们“撞南墙”，明白原有的路径是一条死路，脱离制度惯性，进行改革，这才有对接和利用的基础。¹两种组织资源有效对接的关键是迫使传统的组织资源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理顺双方的产权关系。“撞了南墙”之后怎么办？关键是理顺产权关系，这样才能做到激励相容，原有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物质形态的资产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如同“大包干”以后，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以充分利用一样。

四、关于社会资本

2002年3月初，成都一些奶牛养殖户把部分牛奶倒入下水道。因为与他们有收购合同关系的华西乳业公司宣布，对奶牛场和奶牛大户实行限量收购，对散户实行降价收购（《燕赵都市报》2002年4月24日）。为了让农民能顺利地进入市场，各方面也大力提倡“公司+农户”的模式，提倡定单农业。通过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使双方都可以吃个定心丸。但定单农业履约率低，又

成了问题。在市场交易中,农户与公司是“竹竿打狼,两头害怕”。公司怕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时,农户不履行合同,把产品私自卖到市场上;农户怕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或供大于求时,公司不履行合同,拒收产品或压级压价。履约率低除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外,交易中的信用匮乏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如何在市场交易中提升各方的信用程度?本书的理论分析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对公司加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组织形式进行研究。

对于社会资本存在不同的定义,几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最近提出为了了解社区社会联系的深度,应有一个共同的框架,这些现象都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相关。“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性,如为了互利而促进协调与合作的网络、行为准则和社会信任。虽然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古典社会学,但当代的概念主要归之于 Pierre Bourdieu 和已故的 James Coleman 这两个社会学家更为近期的著作。Bourdieu 首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使用这一术语指在某些社区里人们通过成员资格获取某些利益和机会。Coleman 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个人通过其社会关系产生的资源。对于 Coleman 来说,社会资本不同于银行账户上的金融资本,人脑中的人力资本,它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是构成社会资源的可持续的网络。社会资本是市民和社区生活的必需的基础设施,它产生了互惠及市民相互接触的行为准则(引自“Civic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Leadership”一文)。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和网络,它一方面鼓励信任及互惠关系同时也构成一个社会互动关系的质量与数量。Michael Woolcock 和 Deepa Narayan (2000)把对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归纳为四种观点:公有社会观点;网络观点;制度观点;协同作用观点(Michael Woolcock & Deepa Narayan: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Research Observer, Vol. 15, No. 2, August 2000, 第225 – 249页)。笔者认为,在

组织与制度创新中，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在发育农村新中介组织资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造现有的组织资源，促成这两种组织资源的有效对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农村各类组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农民才能顺利进入市场。

五、关于对另一类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研究

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大框架下，除了进一步深化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外，还应进行农村层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速农村的组织创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村中介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农民自己的农用生产资料购买及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方面的合作组织的形成。通过组建农民的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千千万万的农民以较低的成本整体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将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但另一个方面的农村中介组织的创新也应引起重视。

2001年11月8日，中国“入世”的前三天，美国马铃薯协会宣布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在北京、广州和成都设立联络处，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宣布：“我们将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美国的马铃薯。”该协会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由7000多位美国马铃薯种植者赞助的非营利性推广组织，会员每售出100磅马铃薯，要向协会缴纳2美分作为活动基金。协会的主要功能是把这笔钱用于市场推广，向马铃薯的中间商及餐饮业界在采购、制作和推广美国马铃薯产品时提供帮助。但中国的农民现在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较为完备、系统的组织形式呢？本文在开篇时说明本书研究的中介组织主要是在生产和市场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各类

经济组织，而不是各种协会、商会、联合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但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应加强对另一类中介组织，尤其是按农产品分类的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各地区现已发展起来的按农产品分类的专业技术协会已具备行业协会的雏形，可加以引导和扶持，使之成为地区一级甚至全国层面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它们将在信息传递、技术服务、市场营销和对外维护中国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行业协会的大多数还是政府机构的外延，多属于外贸系统，在维护中国生产者和相关企业的利益方面做的还很不够，但也有较为成功的事例。2001年6月，韩国和日本暂停进口中国禽肉，同年8月，由山东省主要禽兔肉出口企业发起成立山东省畜牧协会禽兔产销分会，成立之后即以协会的名义直接向韩国、日本驻华使馆提出抗议和要求，向欧盟有关委员会通报情况。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努力，使问题较快得到了解决。此外，禽兔产销分会在争取出口、推进标准化饲养、加快畜禽育种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人总结世界各国行业协会的经验，认为它们应具有“服务”（为企业及时提供技术咨询和行业信息），“代表”（在遭遇反倾销、反垄断调查时，代表企业统一应诉，或代表行业接受政府授权委托。开展统计调查、审核准入等），“协调”（制定行业标准、质量规范，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自律”（警示惩戒违反行规行约的会员）四大功能（《解放日报》，2002年2月19日）。但行业协会不仅应有加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代表，也应有生产者（养殖户）的代表参加，而且主体应是生产者，就如同美国的马铃薯协会、大豆协会那样。从长远看，在农业的决策上应组成政府有关部门、涉农企业、以农产品生产者为主体的行业协会、贸易部门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各种农产品的销售理事会，最终建立起代表农民利益的地区或全国一级的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与农业有关的商业性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由各方利益

代表与政府一起决定农产品的生产布局、结构和数量,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大政方针,这将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入世”挑战的治本之策。农产品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应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完善》的最终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张晓山,主要参加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苑鹏、杜吟棠、国鲁来、潘劲、钟瑛、崔红志,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刘惠、熊进,中国人民银行合作金融管理司的马忠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罗远信。毋庸讳言,这种多部门与多方面的合作对提升研究的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课题进行中和结项研讨时,张从明、陆学艺、郭书田、李惠安、缪建平、谢义亚、温铁军、程漱兰、姜长云、何广文等政策研究部门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论,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茂生总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际与经济编辑室的曹宏举主任对本书的出版,热心支持,鼎力相助;韩育良同志曾担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合作撰写、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简称:农村经济绿皮书)前五本书的责任编辑,一直关注“三农”问题,此次她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保证本书的质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所有这些热心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在感激之余,无以回报。如本书的出版能在促进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增进中国农民的福祉方面起到些微作用,能使读者在阅读后无浪费时间之叹,我们也就心安了。是为前言。

张晓山
2002年5月5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理论研究

第一章 总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

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完善	(3)
一、研究内容和需要验证的理论假设	(4)
二、传统的组织资源——问题与现状	(6)
三、新发育的组织资源——问题和现状	(15)
四、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促进传统的和新发育的 两类组织资源的对接	(27)
结语	(40)

第二章 改造传统的组织资源

——供销社近期改革措施的实证研究	(43)
一、问题的提出	(43)
二、供销社近年来改革进程的实证分析	(46)
三、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供销社一种有希望的 改革进展	(53)
四、余论	(60)

第三章 乡村社区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